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共产国际苏联在新疆的活动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新疆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资料丛书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国际、 苏联在新疆的活动

主 编 徐玉圻

副主编 刘冠章 高朝明

朱杨桂 杜 瀚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08 号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国际、

苏联在新疆的活动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党史研究室

徐玉圻 主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新华书店发行

自治区党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6.75 印张 181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631-0786-X/K·55 定价:10.00 元

编辑说明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国际、苏联在新疆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资料丛书之一。本书内容包括《概述》、《活动纪事》、《主要人物小传》、《历史资料、回忆录、访问记》、《报刊资料摘录及索引》五个部分。主要是记叙 30 年代由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进行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艰苦奋斗的业绩。

本书是在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现为党史研究室)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1986 年春,由原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富文同志主持,组成了以徐玉圻为组长、刘冠章为副组长的编写组,着手收集资料、调查访问、研究编写提纲等。我们多次查阅了有关档案和报刊资料,访问了 30 年代由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力求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使之成为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但由于档案材料很少,绝大多数当事者已离开人世,有些问题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还难以作出深入的、比较肯定的结论,只有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了。

本书由徐玉圻任主编,刘冠章、高朝明、朱杨桂、杜瀚任副主编。《概述》第一稿由杜瀚撰写,后经徐玉圻、刘冠章、高朝明、朱杨桂改写,最后由徐玉圻修改、补充、定稿;《活动纪事》由高朝明编写;《主要人物小传》由杜瀚、朱杨桂、徐玉圻、刘冠章、陆振寰编写;《历史资料、回忆录、访问记》主要由高朝明收集整理;《报刊资料摘录及索引》主要由朱杨桂、高新生收集整理。于砚林也参加了部分资料收集工作。全书由徐玉圻修改定稿,高朝明也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修改,并对书稿的打印、校对、联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初稿于1991年8月完成后，由党史研究室召集有关同志进行讨论，征求意见，杨芊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提供了撰写人物小传的补充资料，我们又做了调查访问，并由王题补写了人物小传。高朝明、朱杨桂、杜瀚分别对有关篇章作了修改、补充，徐玉圻对全书又进行了修改、统稿。最后，由陈统渭同志审定。

在本书出版之际，对原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邢松贞、寇清平，现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统渭、张玉玺的支持和党史研究室其他同志的帮助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6年1月21日

目 录

一、概 述	(1)
二、活动纪事	(22)
三、主要人物小传	(40)
四、历史资料 回忆录 访问记	(85)
五、报刊资料摘录及索引	(164)

一、概 述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国际、苏联派遣一批干部、专家、顾问,包括一部分曾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去苏学习、工作,以后又加入联共的党员干部到新疆,帮助盛世才平息战乱,稳定政局,制订六大政策,整顿财政经济,开始力所能及的建设。他们在新疆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地进行工作,深得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同时也招致了盛世才的忌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这批加入联共的中共党人进行诬陷,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于 1938 年撤回苏联。其中有些同志在苏联肃反中遭受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革命胜利前后,绝大多数同志回归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贡献力量。他们是最早到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他们在新疆的工作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光荣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本书记叙的主要是这批受共产国际、苏联派遣到新疆进行革命活动的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艰苦奋斗的业绩。

联共党人来新疆工作的历史背景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资源丰富。古代,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进西出,沟通我国与欧亚各国的联系,曾与中亚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近代,它又成为俄、英、日帝国主义角逐之地,争夺激烈,并且利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可以这样说,新疆从古到今,就是祖国西部

的屏障和门户，是通向世界，尤其是苏联和中亚各国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疆由于地理位置、民族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曾经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十分重视的地方。他们在30—40年代初，通过新疆地方当局，以各种名义多次派人来新疆帮助工作。来疆工作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既有联共和中共党员，也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军事人员。他们在新疆各地区各部门，除从事政治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团结各族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外，还担任各地区和各部门的领导工作，从事行政、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通、治安、情报等各项具体工作。

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什么这样重视新疆？除了新疆地区本身具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和共产国际的基本宗旨与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苏联自身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等诸因素。

从苏联来说，推进世界革命，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列宁的一贯立场和思想，也是联共和苏联政府的既定方针和对外政策。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已制定了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仅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上，还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它将使亚洲获得解放和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会议表示“俄国无产阶级以衷心的兴奋和充分的同情注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成功”。

1916年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同一切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和奴隶最紧密地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利益之所在，否

则,欧洲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巩固的”。^①

1919年7月底,苏维埃政府发出《告中国人民与南北政府书》,庄严声明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宣布旧的不平等条约失效,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向中国政府提议现在就同苏维埃国建立正式邦交。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敌视,直到1924年5月列宁逝世后才签订了《苏中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苏联在列宁思想及其对外政策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多次派人来中国指导革命,并且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应当说,这是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从共产国际成立后的活动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来看,问题也非常清楚。自共产国际成立起,它就一直关注并多次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且有许多指示和决议。

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东方各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印度、朝鲜、伊朗、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在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到在欧美活动的各个政党身上,但同时,执行委员会也意识到,最近期间的东方问题日益起着巨大的作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给予东方各国共产党人以十分明确的指示,下届执行委员会应为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国际拥护者十分具体地制定出行动路线,应对他们即将展开的宏伟斗争给予全面的支持。”^②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又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前沿阵地的斗争。中国革命依然是共产国际关注的中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3版,第2卷,第774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40—841页。

心。”^① 这表明中国革命始终是共产国际十分关注的问题。

至于说到 30 年代为什么会有成批的共产党人先后从苏联来新疆帮助工作,除了上述原因外,也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新疆地方的政局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国际形势正在起变化,德意法西斯已相继登台,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并向华北、内蒙进逼,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1930 年 6 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曾指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党应当加强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党应当同中国北方的回民运动、内蒙的民族革命斗争、满洲的朝鲜工农斗争,以及中国南方苗瑶族的斗争,建立牢固的联系,并加以领导。”^② 1932 年 9 月,共产国际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任务的提纲中也提到“反革命的反苏战争正在加紧准备之中”,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满洲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就把武力瓜分中国武装干涉苏联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广泛宣传中国工农与苏联结成兄弟联盟的口号”。^③ 1933 年 1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13 次全会上,库西宁在《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又明确指出:“英、日帝国主义策划新疆叛乱。”^④

当时,新疆的政局十分混乱。1933 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上台执政,但当时新疆仍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分别控制着北疆、东疆、南疆的广大地区,英帝国主义策动沙比提大毛拉等人搞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准备在喀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334 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92、97 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184、185 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190 页。

什粉墨登场，盛世才仅控制迪化及附近几个县，在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仅对盛屡屡不予正式任命，并派参某次长黄慕松率领宣慰使团来新，准备接收新疆省政权，将权力收归南京中央政府，结束辛亥革命以来新疆半独立的状态。1933年10月，马仲英、张培元率军围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同），建立伊始的盛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摆脱危机，当时摆在盛世才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寻求苏联的援助。1933年5月，盛派外交署署长陈德立会见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与苏联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随后，盛世才又复请孜拉肯，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希望与苏联合作，待平定马仲英、张培元等部进攻后，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苏因对盛不甚了解，未明确答复。1933年10月，盛在达坂城（乌鲁木齐市近郊）与马仲英军交战失利，迪化被困，粮弹无以为继，形势十分危急。盛又派陈德立赴苏求援，苏政府经慎重考虑后，于1933年11月派熟悉新疆情况的阿布列索夫为驻迪化总领事。盛向阿进一步表示亲苏诚意，请求苏联派军队来新疆援助，苏政府决定援助盛世才，出兵新疆，帮盛击败张培元、马仲英，以稳定盛政权。

苏联决定援助盛世才，除了国际主义和苏对外政策的需要外，是有多方面考虑的。苏联认为，马仲英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如马在新疆得势，则日本侵略势力将从我国东北延伸到新疆，使苏联东起远东，西至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地区，都将受到威胁。南疆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这对苏联中亚地区已带来不良影响。而国民党中央政府支持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对苏联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只有盛世才是可以支持的合适对象，因为盛既是南京中央政府承认的新疆地方政府的合法代表，又多次作了亲苏表示。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先后派遣两支军队从霍尔果斯和塔城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消灭了张培元部，击溃了马仲英部，最后解决了和加尼亚孜的问题，从而结束了自1931年以来新疆战乱频仍的局面，使盛世才政权渐趋稳定。

此外,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看,新疆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如果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权,那么沟通和加强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将是一个很好的通道。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加强对陕甘宁的政治军事领导,将川陕苏区联系起来,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同新疆的联系”,是对“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新疆这个通道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显然也是苏联愿意支持盛世才,同盛建立联系的一个因素。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从苏联到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之所以集中在30年代特别是1935年前后,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各批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来的目的也不相同,但它却明显反映了共产国际为了领导和支援世界革命,苏联为了加强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控制,确保自身的安全,支援中国革命,因而才在战争威胁日益增长、国际革命形势开始高涨、中国处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盛世才又有某些进步表现并且多次主动要求苏联援助的情况下,选择了新疆这个在地理和民族问题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地方进行革命活动,以求实现革命的战略目标。

联共党人和苏联顾问陆续派遣到新疆

新疆既然对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疆是否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对苏联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苏联一直十分关注新疆的政局,支持新疆地方当局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沟通经济联系,扶植亲苏势力上台,以建立一个亲苏倾向较浓的地方政权。苏联在帮助盛世才击败马仲英、张培元等敌对势力之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巩固盛世才的统治,有必要继续给盛政权以援助。

从盛世才方面来说,虽然取得了政权,但由于长期的战乱,工农

业生产凋敝，市场萧条，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南疆的喀什、和田，有和加尼牙孜和马仲英的余部马木提、马虎山盘踞，在东疆的哈密有尧乐博斯把持，政权仍不巩固，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继续求助于苏联，向苏提出派遣顾问、专家、干部来新疆帮助工作。这对苏联来说既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原则。于是苏联在1935年前后向新疆派遣了大批顾问、专家，诸如军事总顾问马利科夫、财政顾问米哈尔曼、政治监察管理局顾问普里豪特卡（包国宁）以及银行顾问、工矿顾问等等，各地区、各部门还有大批专家。同时，还派遣了一批原为中共党员以后加入联共的中国人来新工作，这批人大部分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经党组织派遣去苏学习，后因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被分配到苏联各地工作，有的加入苏联国籍，转为联共党员。这里我们着重谈谈这些人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情况。

在盛世才取得政权之前，1930年前后，已有一些人自苏联进入新疆，这些人情况比较复杂。据了解，这些人中原在国内确系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到苏联学习的，有张义吾、竺清旦（化名刘晓平）、陈冰（化名钱绮天）等人；至今政治身份众说纷纭而无确凿证明的有：陈中、熊效远、胡鹏举、卞福林（化名卞方明）等人。这批人到新疆的真实原因也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另一种说法是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的反对派事件，因“托派”或“托派嫌疑”等问题，被苏联遣送入新，自谋生路的。其中有的因在新疆工作有成绩，得到苏方承认，又重新接上组织关系的，如张义吾就属这种情况。

这批人中有在军队工作的，如陈中、竺清旦等；有做公安工作的，如张义吾、熊效远、胡鹏举、卞福林等；有在文教部门工作的，如陈冰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被盛世才杀害。张义吾等人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最早从苏联进入新疆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1934年到1936年，苏联向新疆派出的大批干部，他们分属于

两个部门：一是由苏联内务部门派来的，到新后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领导；二是由苏联军事部门派来的，到新后属苏联军事顾问团领导。这批人中，1935年进入新疆的最多，大约有25人。其中，由苏联内务部门派来的，约15人左右。他们分别在行政、公安、文教等部门工作，其中有5名少数民族。这批人中有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领导人俞秀松（化名王寿成），来新后任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新疆影响较大。1934年7月，随苏联顾问普里豪特卡到新的王立祥（化名曾秀夫）任新组建的新疆政治监察管理局秘书长。在公安管理处工作的有任岳（化名刘贤臣，任副处长）和哈德尔阿吉、色以提阿吉、哈斯木阿吉、阿拜等人；在电信通讯部门工作的有交通处代处长稽直（化名栾宝廷）；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有运输管理局副局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财政厅副厅长、后任和田地区行政长（相当于专员）的郑一俊（化名郑义钧），喀什地区行政长张逸凡（化名万献廷）；在宣传文教和外交部门工作的有任过外交处处长和新疆日报社社长的赵实（化名王宝乾）、副社长满素尔，以及在省立女子中学任教的王一（化名高秀影）和赵云蓉等。

1936年，苏联军事部门又派一批人到新疆工作，受苏军事部门直接领导。这批人主要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协助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情报机构——边务处工作。其中有任边务处副处长的刘进中（化名陈培生）及其妻张鲁丝，派到边务处的秘密情报站兰州举记商行任经理的肖项平（化名俞鸣九）、罗静宜（化名孙若梅），曾任二里子河情报站主任的高布泽博（化名李宝华，蒙古族）及其妻刘淑明等人。还有在苏联军事顾问团中工作的赵唯刚（化名赵国元）等。

上述从苏联派来的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时均遵守苏联政府和盛世才达成的协议：不公开身份，不发展组织，不公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937年4月底，陈云、滕代远等同志来新疆开展工作后，他们也同中共在新疆工作的机构和干部发生联系。他们被派到新疆的主

要任务是帮助盛世才政权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按照“六大政策”建设新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使新疆地方政权成为亲苏政权，以维持中苏边境线的和平与安宁，确保苏联同新疆毗邻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稳定。他们在新疆只是执行苏联和盛世才交办的其他任务，重大问题的决策由盛世才和苏联有关方面磋商决定。

这批共产党人是在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下最早到新疆工作的。他们在新疆工作，既对当时盛世才政权的巩固，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灾难深重的新疆各族人民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新疆工作积累了经验。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新疆成为苏联、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重要通道；抗日战争中，新疆成为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物资进入内地的主要国际通道，应当说与这批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但是由于这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使他们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增长，从而招致了盛世才的猜忌；加之，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向盛世才散布了一些不实之词，因而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于1938年返回苏联。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有的遭迫害致死，有的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胜利后，除王立祥、张逸凡等少数几人继续留在苏联外，活着的同志均先后回归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他们在新疆的工作，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光荣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联共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

30年代陆续来疆工作的联共党员对新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主要革命活动是：

（一）帮助盛世才制定和实行六大政策，改组反帝会，培养活动骨干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政府提出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

育上一律平等等十大纲领。1934年在庆祝“四一二”政变一周年大会上，盛世才宣布“八项宣言”。4月18日，新疆民众大会召开时，盛世才宣布亲苏政策。1934年，在苏联和联共党人的帮助下又提出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1935年4月12日，第二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盛世才又提出九项任务。1935年上半年在三大政策基础上加“亲苏”“清廉”两大任务，六大政策已有五项。1935年下半年，再加上“民平”（即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样六大政策就确定下来。随后，联共党员张义吾、王立祥等用马列主义观点帮助盛世才对六大政策进行理论阐述，以盛世才的名义出版了《政府目前主要任务》和《六大政策教程》，从此，六大政策作为完整的纲领和政策正式形成。从当时国际、中国 and 新疆的实际出发，制定的六大政策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对新疆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个政策是进步的。

为了贯彻其政策，盛世才授意他的同学、同乡，当时被称为“十大博士”的何语竹、郎道衡等人建立了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即“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该会于1934年8月1日宣布成立，重要职务几乎都由盛的同学、同乡担任。1935年5月俞秀松、任岳等来疆工作，7月俞秀松、王立祥、赵曾省等人被通知到苏驻迪化总领事馆听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传达共产国际文件精神 and 国际东亚司负责人谢苗诺夫讲话，要求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加紧革命活动，掌握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随后，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又同盛世才交涉，对反帝会进行了改组，将何语竹等调离反帝会，取消委员长制，改由盛世才任会长，李溶、和加尼牙孜任副会长，提高了反帝会的政治地位，同时任命联共党员俞秀松为秘书长，任岳为组织部长，张逸凡任宣传部长，郑义钧任民众部长（郑义钧后来还担任民联总会秘书长），包尔汗任民族部长，张义吾任青年部长，满蒙尔任文化部长。反帝会的日常工作由俞秀松主持。这样，反帝会的实权就掌握在联共党员手中。

俞秀松主持反帝会工作后，加紧反帝会的整顿工作。1935年11月7日召开了反帝会总会临时全体代表大会，会议修改并一致通过

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以及《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员惩戒条例》。新章程对反帝会宗旨作了重大修改，规定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为新疆各族各界民众自动的群众的政治组织。依照孙中山先生之反帝主张，领导新疆各族各界民众切实执行新政府的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各民族一律平等六大政策。新章程还规定反帝会应完成的十三项任务及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新章程对吸收会员规定了严格的手续，并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经过整顿的反帝会成了一个政策鲜明、组织严密、机构健全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从而推进了反帝会的组织发展。到1936年底，反帝会组织计有5个区会40个分会，会员达5218人，比1935年增长了一倍多。反帝会曾多次举办反帝训练班，培训干部，学习内容有社会科学和新哲学等，俞秀松等常给学员们上课。为了对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革命理论和六大政策的宣传，由联共党员积极筹备出版会刊，取名《反帝战线》，于1935年9月1日正式出版。《反帝战线》的编辑有5人，其中有联共党员俞秀松、张逸凡、陈冰三人。刊物一出版，人们就争相购买阅读，成为深受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进步刊物。

（二）推动新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来疆工作的联共党员把推动新疆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作自己在新疆的重要工作，并通过反帝会、民联会去开展此项工作。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在联共党员努力下，在全疆各族群众抗日热情推动下，盛世才于1936年7月发表了反映新疆各族人民要求抗日、拥护中共《八一宣言》、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七项救国纲领。这个纲领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反帝会利用七项救国纲领，领导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